

---

# “亦思巴奚”初探

廖大珂

---

据史籍记载，元末海外穆斯林商人在泉州发动“亦思巴奚”之乱，历时10年之久，不仅给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祸及福州、仙游、莆田等地。史家对这一事件曾作了不少研究，然而有关“亦思巴奚”的词源、词义及其性质，仍言者纷歧。本文试就这些问题提出粗浅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

关于“亦思巴奚”的词源、词义有两说。一说以张星烺先生为代表，认为“亦思巴奚”乃波斯语 Ispahan 的译音，Ispahan 是伊朗一古城之名，又译称“亦思法罕”。<sup>〔1〕</sup>朱维干和庄为玘先生亦持此说，并进而推论“亦思巴奚”首领赛甫丁和阿迷里丁发动叛乱，是打算割据泉州，建立一个亦思法罕的独立王国。<sup>〔2〕</sup>然而陈达生先生对此说提出异议，“‘亦思巴奚’即‘亦思法杭’之推测值得商榷。根据已发现的史迹，宋元时代侨居泉州的穆斯林，即有来自巴士拉、哈姆丹、艾比奈、土耳其斯坦、施拉夫、设拉子、贾杰鲁姆、布哈拉、花刺子模、霍拉桑、亦思法罕（杭）、大不里士、吉兰尼等地；其中波斯来的为众是事实，但亦思法罕人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无论如何也无法认为这些‘亦思巴奚’兵均为亦思法杭人。‘赛甫丁及阿迷里丁皆波斯德黑兰城东南294公里的亦思法杭城人’未见有史证，不宜下结论”。<sup>〔3〕</sup>陈达生氏所说甚是，“亦思巴奚”为“亦思法杭”城之说，难以凭信。

另一说是日本学者前岛信次提出的，认为：“亦思巴奚”源自波斯文 Ispah，意即军队、士兵。陈达生先生支持前岛信次的观点，并称：“亦思巴奚”是指当时侨居泉州的海外穆

斯林组成的义兵。<sup>[4]</sup>此说在对音上相符,词义上也有一定的说服力。然细推敲之,则不无疑窦。若“亦思巴奚”为 Ispah 的对音,指的是元末海外穆斯林的义兵,那么它的出现只能在元代,然而该名称在唐代似已有之。《宋高僧传》记载,“开元年间,北印度僧人不空,遵师遗令,返五天竺师子国……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诃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等三十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附昆仑舶离南海”。<sup>[5]</sup>文中“伊习宾”与元代“亦思巴奚”显然为同名异译,指的都是同一回事。因此,“亦思巴奚”为 Ispah 之说同样值得商榷。

## 二

“亦思巴奚”这一名称究竟来自何处?笔者认为,“亦思巴奚”与“伊习宾”都是从波斯语 Shahbandar 转译过来的,现多译作“沙班达尔”。波斯人称港口为 bandar, Shahbandar 意为港务长,《宋高僧传》记载中的“蕃客大首领”乃其意译。

在波斯语中,常在名词之前加 i, i 与阿拉伯语的 al 性质相近,有点像英语的定冠词 the。如《新唐书·识匿传》所记载的城名“塞迦申”即今阿富汗之伊什卡什姆(Ishkashim);<sup>[6]</sup>《新唐书·康国传》的地名“悉计蜜悉蒂”即今阿富汗之伊什卡姆希(Ishkamish);<sup>[7]</sup>马来半岛的古国狼牙修,在泰米尔碑铭中写作 Ilangasorm; 苏门答腊岛的兰无里,同碑铭作 Ilamuri,都是受波斯语影响的例子。直到近代,波斯语 i 的用法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影响仍然甚深。玉尔氏云:“肯宁翰少将谓印度回教徒于欧人姓名元音字前有 S 者,往往不能读清,例如 Smith 或 Sparks 悉讹作 Ismith 及 Isparks”。<sup>[8]</sup>故 Shah-bandar 可读作 Ishahbandar。

又“亦思巴奚”的末字“奚”在闽南语中读作 he,<sup>[9]</sup>而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往往将 dar 转读为 h,例如婆罗洲西南之假里马达(Karimada)群岛,应读作 Karimuh。<sup>[10]</sup>所以“亦思巴奚”与 Ishahbandar 的对音正合,伊习宾也是从同一名词译过来的。由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有将职务作为人名的习惯,古人将其译成汉化人名时,略去末尾的 dar,只译其中三个音节。这种译法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如 Saggid-ajall 译作赛典赤,Alimuhammad 译作李河末;AbuMuhammad 译作蒲麻勿。

然而应该说明,“亦思巴奚”的“奚”字似为“夷”之讹,“夷”指外国人也。“亦思巴奚”之名称不见于《元史》记载,亦不见于元人有关泉州之乱的记载。例如,吴海《双谷叙·赠秦景容》将泉州海外穆斯林商人武装称为“商胡”;<sup>[11]</sup>宋濂《故江东金宪郑君墓志铭》称为“泉南回纥氏”;<sup>[12]</sup>《李公(士瞻)行状》则称其首领为“海酋”。<sup>[13]</sup>“亦思巴奚”之名主要见于后人纂修的《八闽通志》、《闽书》、《泉州府志》、《福建通志》、《兴化府志》、《晋江县志》等地方志。据说“亦思巴奚”之名称是出自明洪武人吴源的《至

正近记》，《至正近记》原本已佚，黄仲昭修《八闽通志》曾录其部分条文，盖因“夷”与“奚”字形相近，转抄错误。其他方志有关“亦思巴奚”的内容皆转录自《八闽通志》，以致以讹传讹。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引《海嶽存稿》，说：“亦思八奚，又作亦思八夷”。<sup>[4]</sup>按，屠寄为清末进士，一生致力元史研究，治学严谨，以毕生精力写成《蒙兀儿史记》，改正了元代记载的许多错误，且“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sup>[5]</sup>又柯绍忞修《新元史》，亦将“亦思巴奚”纠正为“亦思八夷”。<sup>[6]</sup>柯氏亦为清末进士，著名学者，所修《新元史》材料充实，不仅纠正了《元史》的许多讹误，并且还补充了许多新材料。他将“亦思巴奚”改为“亦思八夷”是有根据的，应以“亦思八夷”为正的。“亦思八”与“伊习宾”当为沙班达尔的同名异译。

### 三

沙班达尔，或伊习宾、亦思八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古代波斯的海外商业制度。波斯人有着非常悠久的航海传统，在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和贸易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史记》称安息“最为大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sup>[7]</sup>安息，指伊朗的帕提亚王朝。当时帕提亚国势强盛，海运发达，在大秦（罗马帝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中起着中介作用。据《魏略·西戎传》“大秦国……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绁，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sup>[8]</sup>

到了萨珊王朝时期（226—642年），波斯人的航海贸易更加活跃，波斯商船大举远征锡兰岛，采购来自远东的丝绸等商品，并最终压倒印度等国商人，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霸主。据6世纪普罗科皮斯（Procopius）的记载，当时罗马教皇曾遣使要求埃塞俄比亚人从印度人手中购买中国丝，再转售予罗马人，以免罗马的金币落入他们的宿敌波斯人手中。但是埃塞俄比亚人却无能为力，因为波斯人出没于以前曾是印度船停泊的锡兰各港口，把来自东方的船货购买一空。<sup>[9]</sup>不仅如此，波斯人还大力开拓与远东的直接贸易，他们的商船频频绕过锡兰岛，进入东南亚海域，远抵中国沿海进行贸易活动。

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兴起，波斯人被阿拉伯人征服，但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并未动摇，反而不断加强，波斯人的远洋帆船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穿梭于东西方之间，有时一次东亚的船队竟达35艘之多，航海贸易规模令人赞叹不已。<sup>[20]</sup>公元727年，慧超云：波斯人“常于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汎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锦之类”。<sup>[21]</sup>由于来华的波斯商船众多，海南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竟成大富，岛上波斯“奴婢居住，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sup>[22]</sup>波斯人海上贸易之繁盛由此亦可以想见。波斯人控制着东西方海上船运和贸易，东亚的外国商人以波斯人为主，“波斯”一词竟成了唐代蕃客的代名词，故中国“南方呼波斯为舶主”。<sup>[23]</sup>在唐朝政府颁布的有关海

商法令中亦以“波斯”一词作为外国商人的指称。<sup>[24]</sup>

古代波斯商人浪迹天涯,商业据点遍布海外,形成许多波斯人聚居的社团。大概“每一个社团各有头人,在当地上以及与当局的全部交涉中,都由头人代表团体成员,各社团都有自己的法规”。<sup>[25]</sup>各国统治者为了招集外国商人也极力笼络波斯商人首领,授其港务长的职务——波斯语称港务长为沙班达尔,来管理外国人社团,促进对外贸易。这种沙班达尔制度不仅对以后的阿拉伯航海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东方各国的社会生活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所留下的永久性遗俗之一乃是:通常都用‘沙班达尔’来称呼港务长,这个官职直到近代通常仍由外国居民担任”。<sup>[26]</sup>

在古代,乃至近代,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对外贸易港口都普遍实行沙班达尔的管理制度。10—11世纪占婆港口宾瓏龙存在着一个外国穆斯林的社区,其管理机构大体是:首领为商务长(Shaikh al-Suq);副手为纳基布(Naqib),主管财政;穆塔希布(Muhtasib,意为监督官)负责管理市场,监督度量衡和物价;另有伊玛目(Iman)或哈梯卜(Khatib)负责伊斯兰教事务,主持礼拜等宗教活动;法官(qadi)负责审理穆斯林诉讼。<sup>[27]</sup>以上的商务长即是沙班达尔,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遍访亚非各国,他在《游记》中记曰:当时印度的贸易大港古里(Calicut)为世界各地商人荟萃之地,“当地的商界首脑是伊布拉欣·沙·班德尔”;另一大港硅隆(Quilon)是“与中国交往的第一座城市,中国人多到此地,穆斯林在当地是受尊敬的人”,“当地穆斯林的头领是穆罕默德·沙·班德尔”。<sup>[28]</sup>沙·班德尔是沙班达尔的另一译名。当伊本·白图泰抵达苏门答腊时,“港务副监督长也登上我们的船只,检查我们带来的商品,并允许我们上岸”。杜洛里耶认为:“这位官员(港务监督长)享有马来亚人中的波斯文尊号班达尔王(Sah-bandar,即沙班达尔一引者)”。<sup>[29]</sup>15—16世纪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心马六甲商业极其繁荣,外国商人云集,则设有四个沙班达尔。其中一个沙班达尔管理来自古吉拉特的商人,第二个沙班达尔管理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孟加拉、白古、巴塞的商人,第三个沙班达尔管理来自爪哇、摩鹿加、班达、巴邻旁、婆罗洲和吕宋的商人,第四个沙班达尔管理来自中国、安南、占婆和琉球的商人。<sup>[30]</sup>早期的沙班达尔从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商人中遴选,但是“在13世纪末叶后,穆斯林商人掌握了经由坎贝和亚丁同红海各港口的贸易时,印度和马来群岛两处的沙班达尔都有由外来穆斯林充任的趋势”。<sup>[31]</sup>随着商业的发展,沙班达尔的地位也日趋上升,有的甚至演变成地方的统治者。<sup>[32]</sup>

唐宋元时期来华的海外蕃客众多,足迹遍及全国,广州和泉州更是其辐辏之地,其中波斯人无论人数还是势力都居各国商人之首,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以广州和泉州必然也存在类似的沙班达尔制度,这就是汉文记载中的蕃长制度。根据是:

1、唐宋元时代,广州、泉州蕃坊都有大量的波斯蕃客寓居,社会生活带上浓厚的波斯色彩。南宋初年,庄绰记曰:“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金枚者,家家以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sup>[33]</sup>根据已发现的史迹,宋元时代侨居泉州的海外蕃客,也主要是来自波斯的商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对泉州的风俗产生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泉

州的回族逢年过节吃“油香”的习俗以及婚丧仪式等都是源自波斯。因此,广州、泉州的蕃坊实行波斯的管理制度是很自然的事。

2、蕃客聚居区已形成自己的首领——蕃长。唐时刘恂在广州“曾于蕃酋家食本国将来者(指波斯枣)”。<sup>[34]</sup>此蕃酋即外国商人社团的首领。又北宋朱彧记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sup>[35]</sup>由于蕃长都由外商首领充任,蕃商“伙首住广州者谓之蕃长”,<sup>[36]</sup>故蕃酋即蕃长,又称商酋,<sup>[37]</sup>或海酋,<sup>[38]</sup>与“蕃客大首领”意义相同,以波斯语称之则为 *Ishahbandar*,前引《宋高僧传》记载中的伊习宾和元代的亦思巴,或亦思八都是其同名异译,指的都是蕃长。实际上当时外国侨民也喜用波斯语 *bandar* 来称呼中国的港口。据阿拉伯人阿伯尔肥达(*Abulfida*, 1273—1331年)《地理志》记载:游历家归自中国者,“又云泉州当今又曰刺桐,为中国诸港之一,港口皆有税关。康府(广州)及泉州两地,皆为中国之班达儿(*bandars*)。中国人谓港口曰班达儿也”。<sup>[39]</sup>元末赛甫丁被称为“海酋”,阿迷里丁被称为“夷酋”,那兀纳(*Nakhoda*,波斯语意为“舶主”)则“以总诸番互市至泉”,<sup>[40]</sup>很可能三人曾先后担任蕃长的职务,故其所率军队称为“亦思八夷”。总之,“蕃客大首领”、“伊习宾”、“亦思八夷”,与蕃长指的都是一回事,都是类似波斯人的沙班达尔那种海外侨民和商业的管理制度。

#### 四

由于沙班达尔通常都由外国商人首领担任,他通晓外国语言,熟知海外情况,且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因此成为当地统治者与外国商人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关沙班达尔的职责,伊本·白图泰提到有:登船检查商品;批准商人上岸。但16世纪初葡萄牙人皮里士则有更详尽的描述:管辖所有入港的船舶和外籍商人;将商人引见给负责征收商税的官员;分配商人贮货的栈房;处理舶货交易;为商人提供住所和运输工具;为国王征收商人的贡品。由于商人是通过沙班达尔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故亦须向沙班达尔“赠送礼品”。<sup>[41]</sup>法佛尔(*Favre*)在《马来——法语辞典》中还说:“在马来人地区,这种官员负责维护港口的安全;征收赋税;在某些地方还负责替国王进行交易;常常也是这类官员向国王引见外来人”。<sup>[42]</sup>

蕃长的职责与上述沙班达尔的职责非常相似,根据中国的记载,蕃长的主要职责是:

1、代表政府行使对外商的管辖权。唐代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的重要职责是“约束舶主”,管辖“番禺界”的外国商人。宋代蕃长的首要工作就是“管勾蕃坊公事”。换言之,即传达执行官府的政令,处理蕃坊的日常政务,管束外籍居民。根据朱彧的记述,“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撻之……徒以上罪,则广州决

断”。<sup>[43]</sup>就是说,外国人触犯法律,先由当地政府审理,罪行轻的送蕃坊由蕃长处罚,若犯徒刑以上罪行,则由当地政府处置。

2、协助官府管理对外贸易。唐时“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主领”。<sup>[44]</sup>元时亦思八那兀纳则“以蕃人主市舶”。<sup>[45]</sup>作为外贸市场的主持人,蕃长还负有应付官府须索,承购官方所需物质之责。如宋时“南海官员及经过使臣多请施工托市舶官,如传语蕃长,所买香药多亏价直”。<sup>[46]</sup>

3、作为官府与海外商人之间的中介人,负责招徕海商。中国封建政府利用蕃长谙熟海外情况,联系面广,经验丰富,令之“专切招邀蕃商人京”,如北宋时大食舶主蒲希密来中国,上表章曰:“昨在本国,曾得蕃长寄书招谕,令人京贡奉”。<sup>[47]</sup>

4、协助办理外交事务,沟通中外双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唐宋元时期,中国与南亚、阿拉伯诸国关系密切,海外国家经常派遣使节入贡,人使来到中国港口,往往由蕃长辨其身份,译制表章,朝廷则根据蕃长的表章,予以接待。所以有的外国商人就“冒称蕃长姓名,前来进奉,朝廷止凭人使所持表奏,无以验实”。<sup>[48]</sup>

从上可见,蕃长的职责与外国沙班达尔几乎完全相同,因此蕃长就是波斯语中的沙班达尔,在唐代又称作“蕃客大首领”或“伊习宾”;在元代则称为“亦思巴”或“亦思八夷”。

注释:

[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第三册,第213页,注一。

[2] 朱维干:《元末蹂躏兴化的亦思法抗兵乱》,《泉州文史》,1979年第1期。庄为玳:《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落》,《泉州文史》,1980年第4期。

[3] 《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4—145页。

[4] 《伊斯兰教在中国》,上揭书,第143—144页。

[5] 赞宁:《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

[6] 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第36页。

[7] 同上书,第87页。

[8] 张星烺译:《马可李罗游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76页。

[9] 《普通语网南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8页。

[10] 费瑛编、耿升等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第429页。

[11] 吴海:《闻过斋集》,卷1。

[12]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49。

[13] 李士瞻:《经济文集》,卷6。

[14]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30,《陈有定传》。

[1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 [16] 柯绍忞:《新元史》,卷219,《陈友定传》。
- [17]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 [18] 《三国志》,卷30,引《魏略》。
- [19] G.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1955, P71.
- [20] 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4,《金刚智传》。
- [21] 慧超:《往五天竺传》,6。
- [22]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 [23] 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全唐诗》,卷407。
- [24] 《宋刑统》,卷12,《死商钱物》。
- [25] 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上册,第188页。
- [26] 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上册,第84页。
- [27] S. Q. Fatimi, Islam Comes to Malaysia, Singapore, 1963, P43-44.
- [28]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9、493页。
- [29] 费瑛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前揭书,第489-490页。
- [30] Armando Cortesao,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res, London, 1944, P265.
- [31] B. J. Schrieke, Indonesian Sbciological Studies, Selected Writings, The Hague, 1957, Pt, 2, P238.
- [32] Ibid, P203, P371 n. 391.
- [33] 庄绰:《鸡肋篇》,卷中。
- [34] 刘恂:《岭表录异》,卷中。
- [35] 朱熹:《漳州可谈》,卷2。
- [3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
- [37] 晏殊:《马忠肃公亮墓志铭》,载杜大珪:《疏坡集删存》,卷2。
- [38] 李士瞻:《经济文集》,卷6,《李公行状》。
- [39]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第二册,第241-242页。
- [40] 《(万历)泉州府志》,卷24,《盗贼类》。
- [41] Armando Cortesao, op. cit, PP265, 270, 273-274.
- [42] 费瑛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前揭书,第490页。
- [43] 朱熹:《漳州可谈》,卷2。
- [44]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 [45] 《(国治)福建通志》,卷226,《元外纪》。
- [4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
- [47] 《宋史》,卷490,《大食传》。
- [48] 张中:《昆陵集》,卷2,《论大食故临国进奉剑子》。

作者廖大珂:1953年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